

木兰围猎在清代民族交融与国家治理的作用研究

张安福

摘要: 木兰围猎是清代创立的官方狩猎活动,也是推动民族交融的政治典礼,对于巩固清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木兰围猎制度渊源于东北民族的狩猎习俗,在辽金捺钵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旨在保持八旗的尚武风俗并提升其军事技能,成为凝聚东北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纽带。此外,清朝通过木兰围猎绥抚蒙古各部,进一步密切了满蒙关系,对于清朝稳定北疆治理,强化“满蒙一体”的政治同盟意义重大。木兰围猎构建了边疆各民族互动交流的空间场域,来自边疆地区的各民族首领在围猎期间随围观猎并朝觐清帝,共商国是。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木兰围猎的政治意蕴,也使之成为清朝深化因俗而治、因时制宜的治理措施,增强边疆多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重要路径,推动了清朝“大一统”格局的最终形成。

关键词: 木兰围猎;满蒙一体;民族融合;国家治理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4-0123-10

木兰围猎也称为木兰“秋猕”“木兰行围”^①,是清代创建的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大型狩猎活动,在民族融合和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王朝通过木兰围猎制度加强了满、蒙、回、藏、汉等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意识,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学界关于清代木兰围猎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在围猎制度演变、围猎管理、围场社会变迁等方面^②,而关于清朝通过木兰围猎凝聚多元族群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

一、清代木兰围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清代木兰围猎制度发源于东北各民族共有的渔猎文化传统。早期,契丹、女真等民族在建立政权后,将渔猎活动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形成了捺钵制度,为清代木兰围猎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通过木兰行围,清王朝以

“寓战于猎”和“以猎代训”的方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八旗军队的战斗力,并以此为契机将东北各民族吸纳至国家治理体系中,充分体现了木兰围猎制度在国家治理和族群聚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 围猎制度的渊源

东北地区渔猎资源丰富,不仅是当地主要经济形式之一,也形成了独特的渔猎文化传统。早期活动于大兴安岭西部草原地带的东胡系族群在随水草而居的游牧过程中形成了“畜牧”“畋渔”并举的渔猎经济,如两汉时期栖息于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的乌桓人就以“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1]2979}而闻名;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肃慎系族群,其源远流长的渔猎文化是东北渔猎文化的核心构成^{[2]8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勿吉人“善射猎”,其“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以石为镞”^[3],长弓利箭是其标志性的符号;以夫余为代表的秽貊系族群“地宜五谷”^{[1]2811},农业发达,同时亦以渔猎活动作为补充。因此,渔猎活动始终是东北多民族生活方式、社会经

收稿日期:2025-0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研究”(24&ZD264)。

作者简介:张安福,男,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济的重要组成和共有的文化传统。

游牧于辽西松漠地带的东胡系契丹民族,首次将渔猎活动由单纯的经济生产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松漠地带“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4]373},形成了契丹民族善骑射、尚勇武的民族性格,其渔猎方式如同中原地区居民应时耕种一般,一年四季各有安排:

北人打围,一岁间各有处所,正月钓鱼海上,于冰底钓大鱼。二月、三月放鹞,号海东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于凉淀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此直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5]

辽朝建立后,其“四时捺钵”之制就是基于本民族“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4]373}的传统经济形式演变而来,分为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辽帝在四季驻扎在不同的地点,进行特定的渔猎和政治活动,接受东北诸部族酋长的觐见与朝贺,主持南、北臣僚会议,商议国是,校猎讲武^{[4]373-375}。有辽一代,捺钵地成为具有国家政治中心功能的事实“首都”,辽帝辗转于各捺钵地之间,在狩猎打围、宴饮娱乐的同时,实现对民族地区的治理。与此同时,辽代也首次确立了“围场”制度,服务于皇家围猎活动,以围场属北面场官,下设围场都太师、围场都管、围场使、围场副使等职官^{[4]731}。

四时捺钵制度为后世女真民族政权继承和发展。女真民族属肃慎族系,久居白山黑水之地,在部落时代,渔猎活动已是其社会生活和经济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真善骑,上下崖壁如飞。精射猎,每见巧兽之踪,能蹶而摧之。得其潜伏之所,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鹿射之。^[6]

金灭辽后,女真统治者延续了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史载皇统三年(1143年)七月,“主谕尚书省,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刺钵”^[7]。金世宗以降,“秋山”场所往往固定在金莲川,皇帝于此宴赐,羁縻北方草原上崛起的蒙古诸部首领,加强对北部边疆的控制和治理。金代皇帝“不惮勤身,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8]2136},其行捺钵的主要目的正是借狩猎、打围的时机练兵习武,维持军队的战斗力。

四时捺钵制度对后世同为女真民族建立的清王朝影响更为深远。早在后金政权肇基时期,出于对外征战的需要,努尔哈赤结合女真民族游牧、渔猎的

经济形式,将围猎活动作为军事训练和实战前的预演^[9],并开始重视围场的设置。东北围场最初设置于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克叶赫东城,降西城,设盛京围场协领管守”^[10]。在征服海西女真后,便于归降的辉发、叶赫部领地上划定围场,设官管理,奠定了盛京围场的雏形。皇太极继位后,也极为重视围场对于军事训练和维持满洲八旗将士战斗力的作用,曾多次亲率王公大臣和八旗将士赴东北围场行围狩猎:

率诸贝勒及官四十员,兵千三百人,出地载门,猎于叶赫地方。^{[11]174}

率每旗一纛额真,每甲喇一旗长,每牛录四护军,行猎于叶赫地方。^{[11]218}

康熙初年,清廷将东北围场按地域划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大围场,并制定了行围狩猎的制度。除部分围场为“御用”及“贡鲜”外,大部分围场作为历年应捕围,为八旗兵丁演习骑射而设^[12],又称大围场,为八旗将士肆武狩猎之地^[13]。东北地区的行围狩猎,分为临时行围和定期行围两种,其中临时行围于清帝巡幸时进行,由兵部知会盛京、吉林将军率八旗兵丁参加,由统围大臣分八旗各翼举行合围^[14]。随康熙东巡的高士奇对行围中的“合围之制”有详细记载:

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旗色分八部,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驰山谷间,逾高降深,名曰围场。惟视蓝旗所向,以为分合,有断续不整者,即以军法治之。

行围之法:以镶黄旗大纛居中为首,圣驾在大纛之前,按辔徐行。两翼门纛相遇,则立而不动,以俟后队渐次逼近,谓之合围。

或皇上亲射,或皇太子射之,亲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围中发一矢。兽有出国者,方许扈从诸人捕之。^[15]

正如皇太极在入关前所言:“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11]446}要之,清初东北地区的围场建设和围猎制度,既是对辽金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又发挥了保持八旗战斗力和本民族尚武传统的重要作用,康熙年间建立木兰围猎制度即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

2. 木兰围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清王朝入关统一全国后,随着统治逐渐稳固,形势趋于安定,满洲八旗有安于享乐、武备废弛的趋势。在康熙初年爆发的“三藩之乱”中,八旗兵几乎

不堪一战,如此颓势引起了康熙帝的忧虑和警惕。为维持八旗军队的骑射技艺和尚武习俗,巩固清廷对北方边疆及蒙古诸部的治理,康熙帝亲自决策,选址建立了木兰围场作为“讲武绥远”的场所。“木兰”为满语“哨鹿”之意,是女真等东北民族传统狩猎方式之一。关于木兰围场的设立、命名和详细规制,史载:

木兰者,围场之通称也。仲秋之后,虞人效鹿鸣以致鹿,曰“哨鹿”,国语谓之木兰,因以名围场云。

康熙中,蒙古诸部献其牧地,规为围场。自是,岁举蒐狩,车攻马同,以师兵为营卫。

而天子亲御王弧,止齐步伐,三驱田禽,寓绥远于训武。其围场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周千有余里,即元代上都、辽金中京上京之地。^{[16]105-106}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率满汉大臣和八旗将士出喜峰口,经宽城进入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与蒙古各盟旗王公及喀喇沁旗3000骑兵会合,共同行围习武,在这一过程中初步勘定了皇家狩猎场的范围^[17],《清史稿》载:

康熙二十年,幸塞外,猎南山。寻出山海关,次乌拉,皆御弓矢校猎。越二年六月,幸古北口外行围,木兰蒐猎始此。^{[18]2668}

木兰围场全境划分为67围,后增加至72围,由八旗官兵按方位驻守其境,为木兰围猎制度的建立做好了场地准备。康熙四十二年,又“建避暑山庄于热河”^{[8]1909},作为清帝驻蹕和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清代的木兰围猎制度与辽金捺钵制度一脉相承,木兰秋狝相当于辽代的“秋捺钵”和金代的“秋山”,而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所在区域,恰是辽代捺钵的重要场所^[19]。

木兰围场设立后,康熙帝几乎每年都前往木兰围场举行行围,木兰围猎逐渐成为清朝寓训练习武于行围狩猎的一项正规制度。正如康熙帝所言:“国家承平之日,武备不可一日少弛。”^{[20]131}此后亦多次下令拣选八旗官兵参与木兰围猎,训练狩猎及骑射技艺。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重新恢复雍正时期暂停的木兰围猎,通过重申祖制的方式恢复了木兰围猎制度,乾隆在位60年,举行木兰围猎达47次,规模更甚,制度更完善,是木兰围猎的鼎盛时期^[21]。与康熙时期相比,乾隆年间的木兰围猎更强调“肄武绥藩”的军事、政治内涵,木兰围猎制度因而得到进一步理论化和典制化^[22]。

清廷对行围中的行军、撒围、布围、射猎、罢围、驻蹕等程序均有严格规定,即“行围所以肄武,法同用兵,阵式务当严密”^{[23]156}。在围猎过程中,围猎者必须听从指挥,“行围之疾徐进止,口敕指挥”^{[24]220},对于不遵军法者,要严肃处理,“有断续不整者,即以军法治之”^[15]。清廷也派遣八旗常驻木兰围场,“以一营房统五卡伦”,“各有地界,分司稽查”^{[25]770},提升军队的日常巡防能力。

围猎之时,清帝与满洲八旗在围猎阵营中处于核心地位,最重要的御前军阵由满洲上三旗负责,“中设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标识之。两翼末”,“各立蓝纛以标识之,皆听中军节制。凡管围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领之”^{[24]219-220}。负责合围的军队在中军指挥下朝皇帝所在的看城方向拉网式收拢,将围场内的牲畜兽向看城广场集中^[26]。“宛若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27]参与随围的各民族各有分工,在合围处设立的幔城,外围由索伦、赫哲等东北多民族组成的新满洲驻扎^[28],“自围墙外至放围处,即重设一层,乃虎枪营士卒及诸部落射生手等,专射自围内逸出之兽,而围内例不准射也”^{[24]220},呈现出清帝主导下八旗官兵为主体,随围各民族共同参与的空间布局。

合围完毕,清朝皇帝率扈从、侍卫、虎枪营士卒与射生手共同射猎合围中的牲畜。皇帝射猎完毕,登看城观围,由王公大臣和各部落射生手进行射猎,兼具在皇帝面前表演的性质:

乃自看城出,御橐鞬,诸扈从大臣、侍卫及亲随射生手、虎枪手拥护,由中道直抵中军,在中军前半里许周览围内形势,了如指掌,而行围之疾徐进止,口敕指挥,只二十三里间,射飞逐走,左右是宜。诸藩部落、蒙古仰瞻圣武,莫不欢欣踊跃。^{[24]220}

在行围过程中清廷重视索伦等东北民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将其吸纳、整合到随围队伍中。黑龙江、吉林将军从东北各民族中遴选神射手扈从出猎,充任猎虎、哨鹿等职。康熙二十三年,从东北进京的猎手组建了虎枪营,“凡扈从之制,遇车驾蒐狩,虎枪总统、总领率所属从,日以十人携虎枪于前导侍卫前行”^{[29]6422}。哨鹿者则多由布特哈人充任,“每岁驾驻木兰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人、呼兰例派官兵十六人赴行在”,“其外有哨鹿者二名,布特哈人”^{[30]36}。“布特哈”即满语中“渔猎、打牲”之意。在后金、清前期,清廷曾设索伦五围、达斡尔三甲喇、索伦总管、布特哈总管衙门等机构和职官加

以管理^[2]163。康熙初年,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东北渔猎民族已经被编为“布特哈打牲部落”,有向清政府及皇室进贡特产的义务及传统,事实上是具有皇家色彩的特殊渔猎机构^[2]164。雍正九年(1731年),在呼伦贝尔八旗编设后,清廷将抽调之余的索伦诸部正式编设为布特哈八旗,隶属黑龙江将军。布特哈诸部正式纳入八旗制度中。布特哈八旗正式编设后,亦参与到木兰围猎之中。布特哈旗人多骑射娴熟者,除选派出征外,自乾隆朝始,每年木兰秋狝都会从布特哈旗“派二十人随驾入哨射生”^[30]106。

清帝也会借木兰行围的机会考察东北各部族射手的技艺,择其优者擢升为侍卫。乾隆十四年,乾隆帝在木兰围猎前夕下令从索伦达呼尔内拣选“墨尔根”(即神射手)“同往试令行围,应留者再着留京”^[31]638。据《黑龙江外记》记载,达呼尔出身的都统阿兰保曾在“微时以射为名”,“会选善射者随驾木兰”,“至则留京师,累官至镶蓝旗蒙古都统”^[30]73。这些从东北民族中选拔出的优秀士兵,广泛参与到木兰围猎之中,木兰围猎成为东北各民族与内地互动的纽带。

以木兰围猎为代表的军事训练机制,在清朝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平定准噶尔、回部及两金川战役中,东北各民族与八旗主力相互配合,为维护国家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正如乾隆阐释清朝武备超越前朝的原因时所言:“皆因平日训练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愆。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习于宴安,骑射渐至生疏矣。”^[29]6065

木兰围猎制度的确立使得围猎具有了礼仪和政治属性,强化了东北多民族以骑射为根本的共同文化记忆,成为清代凝聚东北多民族的精神文化纽带。如在木兰围猎之时,索伦人所使用传统弓箭即被纳入了礼器范畴。按《清宫武备》记载,乾隆每次出猎时都会携带十一支“御用白档索伦长铍箭”^[32],索伦人的传统武器升格为御用之物,具有了皇家威仪。乾隆十五年十月,乾隆帝还专门下令禁止索伦部使用火枪,“夫围猎用弓箭,乃从前旧规,理宜勤习,况索伦等皆猎兽之人,自应精于弓箭”^[31]1129,以保持索伦部使用弓箭的传统。此外,乾隆二十三年郎世宁与方琮共绘的《丛薄行诗意图》中描绘了索伦侍卫在布鲁特使臣面前将徒手生擒的幼虎敬献给皇帝的场景,彰显清帝宣扬国威、震慑外藩的气度^[33]。这种对东北本土骑射文化纳入中央宫廷仪式的改

造,在延续狩猎传统的同时增添了重要的政治意涵。

正如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言:“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16]13清朝通过木兰围猎制度强化了对东北各民族的治理整合,紧密了双方基于共同文化记忆的情感联结,最终使木兰围猎成为强化东北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场合。

二、木兰围猎推动“满蒙一家”局面的构筑

蒙古作为清王朝立国时最重要的盟友,在清王朝“大一统”天下格局的建构中具有显著的军事、政治地位。木兰围猎的设置与选址,既有巩固北部边疆的用意,又有顺势加强整合蒙古诸部的治理意图。“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16]105木兰围猎是由满蒙双方共同参与的政治活动,是清廷用以绥抚蒙古的重要举措。在历经了康、雍、乾三朝体系化建设后,木兰围猎制度成为加强满蒙双方关系的纽带,密切了满蒙双方的交融,构筑了“满蒙一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关系,成为清廷经营北部边疆及强化国家治理的基础。

1. 满蒙同猎奠定族群联盟的基础

围猎作为满蒙双方共有的文化传统,其军事属性成为维系双方政治联盟的纽带。通过木兰围猎中蒙古随猎、满蒙同猎活动,清廷不仅提升了满蒙联兵的协同作战能力,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蒙古诸部的管理,极大地增强了蒙古贵族对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

木兰围猎的创设建立在满蒙共同经营的基础上。康熙二十年,康熙帝会同喀喇沁郡王札锡、公吴特巴喇等“因前往相度地势”^[34]687,在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漠南蒙古诸旗所献牧场之上创设了木兰围场^[35]399。木兰围场由周边蒙古喀喇沁、翁牛特、巴林、阿鲁科尔沁等部负责日常管理,并派遣蒙古兵丁承担戍卫警戒。至康熙四十五年,清廷又由兵部设立捕盗总管一员,专门负责围场事务,标志着木兰围场正式被纳入中央直接管理的范畴。满蒙官员共同经营木兰围场的模式,既延续了蒙古传统的治理经验,也保障了中央政令的有效推行。

清廷通过围班制度确立了蒙古王公前往木兰围场随猎朝觐的次序。清朝规定:“外札萨克蒙古王公台吉等业经出痘者,均于年班来京,其未经出痘者,止于热河瞻觐。”^[23]605康熙时期,参与木兰围猎

的大多为漠南蒙古诸部,按乾隆六年乌苏里雅台将军所奏:“从前圣祖仁皇帝时,御前及乾清门行走并谙于骑射之喀尔喀台吉等,均扈从随行。”^{[36]308}至乾隆年间,归附的漠北、漠西蒙古各部也被纳入围班制度。乾隆五十三年,伊犁所属的土尔扈特,科布多所属杜尔伯特、阿尔泰乌梁海及乌里雅苏台所属之唐努乌梁海,按漠北、漠西蒙古的制度亦分为四班,按年轮赴木兰随围^{[36]310},“各王公等每年分班于热河朝觐后,亦令随围木兰与旧札萨克等”^{[25]812}。

满蒙双方非常重视木兰围猎并共同参与其所有程序内容。在木兰围猎的准备阶段,“理藩院行文札萨克王公等,先时戒备,随围执事”^{[25]788},形成了中央统筹、地方执行的组织结构。参与木兰围猎的蒙古士兵从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除驻守围场周边的蒙古各部之外,驻京蒙古八旗与地方蒙古各部都要选拔士兵参加。科尔沁诸部按年例精心选出一千二百五十人充当合围围墙的蒙古虞卒,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巴林及敖汉等部则提供管围官员、虎枪手等一千九百零八名^{[36]311}。在木兰围猎过程中,满蒙士兵按照行军列阵的形式排布:

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并八旗劲旅、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视其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纤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十里、五十里以及七八十里,齐至看城,则为围合。^{[24]220}

蒙古王公“侍上左右,听指挥唯谨”^[37],使其“驯而习之于驱策之中”,充分调动了蒙古王公、兵丁,强化其统帅及服从意识^{[38]152}。满蒙士兵在围猎过程中的相互配合有效增强了双方在行军演练中的组织性和协调性。

此外,在围猎期间,清帝还会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并对随围蒙古王公进行赏赐、按例封爵,“先期行在理藩院奏闻蒙古诸部王公职名,请派一人进爵”^{[25]812-813},充分加强对蒙古诸部政治上的管理,进一步加深了满蒙之间的情感联络。

通过木兰围猎,清廷借助“满蒙同猎”“围班宴赉”等一系列政治仪式,密切了满蒙之间的往来与交流,巩固了朝廷和蒙古王公上层势力间的关系。蒙古王公贵族在感受中央的宽仁与恩泽的同时,心悦诚服地效忠于清廷。正如乾隆在《宴蒙古诸王公》一诗中所言:“瑞云卿拥拂庐穹,诈马筵陈许贡衷,典属威仪五等列,本朝恩数一家同。”^{[25]242}这充分彰显出木兰围猎对于维系满蒙双方感情的关键意义。

2. 满蒙合兵的军事体系建设

木兰围场不仅是满蒙上层加强情感联络的关键场所,更是训练满蒙协同作战的核心地区,对于国家军防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木兰围场“地当蒙古诸部道里之中,为曩昔枕戈擐甲之所”^[39],是连通京师与蒙古高原乃至沙俄边境的交通要道。康熙帝在勘定围场时就特别强调其地缘价值,因此在围场落成后即派阿鲁科尔沁郡王色楞、额駙巴特玛等进行管理^{[38]150-151}。在休猎时期,围场由蒙古章京率领翁牛特、克什克腾等附近蒙古部落的八旗兵丁驻哨看守^[40]。这些驻扎木兰围场的满蒙八旗士兵构成了拱卫京师的北部屏障。

满蒙合兵训练提高了双方的协同作战能力,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就是满蒙合兵成果的充分体现。康熙二十八年,准噶尔部击败漠北喀尔喀蒙古,一路追击喀尔喀残部,进入了清朝边境。康熙帝闻讯后,率满汉官兵与漠南、漠北诸部的蒙古骑兵征讨噶尔丹。次年正月,清廷征调鄂尔多斯、内喀尔喀右翼、归化城、四子部落兵共三千名,喀尔喀兵三千名等^{[20]595}组成蒙古骑兵,负责协助携带火炮的满汉士卒驻守洮赖河(今洮儿河)上游,监视并牵制噶尔丹的行动。随后,噶尔丹军越过呼伦贝尔(今贝尔湖)进入乌珠穆沁草原。面对此情境,康熙帝调遣敖汉、土默特、奈曼等部蒙古骑兵戍守科尔沁草原迎击噶尔丹军,又命内大臣苏尔达前往科尔沁部,召集蒙古东四盟科尔沁的两千余人,联合盛京、吉林的满军官兵,切断噶尔丹的退路^[41]。七月二十七日,噶尔丹主力抵达乌兰布通后,清军满蒙八旗进驻围场北部的吐力垭河,双方齐心协力,最终共同击退了噶尔丹。

在乌兰布通战役中,蒙古八旗、察哈尔蒙古和内蒙古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三盟及喀尔喀蒙古的骑兵悉数“从征噶尔丹”^{[18]14332},为战胜噶尔丹齐心协力。康熙帝对阿鲁科尔沁将士在作战中的英勇表现赞誉有加:

蒙古等感戴本国之恩,忘身以奉事者甚众。当索约尔济河地方,与噶尔丹交战时,阿鲁科尔沁之董牛忒台吉,自战场出,谓众曰:“我等受皇恩甚深,今败北,有何面目见圣颜乎!”率伊属兵三百名复进,皆没。^{[34]2416}

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满蒙联军的士气,推动了漠北蒙古的归附进程。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亲率上三旗和古北口绿营官兵溯滦河而上,北巡至多伦诺尔,宴请新归附的喀尔喀蒙古及漠南

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贵族,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在会盟中,康熙帝按漠南蒙古的盟旗制度对喀尔喀蒙古划界分旗,其中“喀尔喀土谢图汗、车臣汗、诸济农、诺颜、台吉决志入内,奏请效力者有之,奏请与四十九旗同列者亦有之”,“朕设大宴厚赐之,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42]。康熙还允许新附的漠北蒙古王公随行检阅清军军容:“八旗满洲官兵、汉军火器营官兵及总兵官蔡元标下官兵各依次列阵鸣角,鸟枪齐发,众大呼前进,声动山谷。喀尔喀土谢图汗、台吉等惊惧失措有欲趋避状。”^{[20]675}清廷通过展示完备的制度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化了在漠北蒙古的政治权威,明确了对漠北蒙古的直接管辖权,至此清朝完成了对蒙古高原的统一^[43]。

通过多伦会盟,康熙帝将多年割据纷争的漠北蒙古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实现了“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20]677}的战略布局,保障了北方边防的安全,实现漠北蒙古各部对清廷的政治认同和人心向化的目的。

由此可见,清廷通过木兰围猎对北方边疆蒙古各部实现了有效治理和军事联合。满蒙士卒在共同狩猎的过程中相互配合,获得了军事合作的实战训练,为满蒙联兵开展军事行动、巩固边疆安全奠定了基础,在保卫清朝多民族边疆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满蒙联姻稳固北疆

满蒙联姻是清代的一项基本国策,目的在于稳固清廷对北部边疆及蒙古地区的治理,使得蒙古王公无论是在心理层面、血统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利益上,都同清统治集团缔结起了牢固的关联^[44]。木兰围场作为促成满蒙联姻的重要场所,其形成与发展与满蒙之间的姻亲交好有着密切关系。

长期以来,驻牧于木兰围场周边的漠南蒙古东部盟旗各部是清廷联姻的主要对象。康熙年间,清廷将康熙帝的第五女端静公主、第十三女温恪公主分别嫁与喀喇沁右旗扎萨克郡王札之子噶尔藏、翁牛特尤其札萨克郡王仓津,此二部与清朝关系密切,不仅曾献出牧地作为围场,而且在管理围场、协围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木兰围场为联姻蒙古的额驸、公主、格格及诸多满蒙姻亲提供了重要的会亲场所^[45]。康熙帝的第三女固伦荣宪公主下嫁巴林部札萨克多罗郡王乌尔衮时,即在木兰行围期间成礼。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康熙帝留驻在热河期间,前来相会的蒙古姻亲就有包括科尔沁部、巴林部等

八个蒙古部落十八位满蒙贵族,其中不乏多次觐见者^③。

多伦会盟后,清廷将满蒙联姻的范围扩大到漠北蒙古,其中恪靖公主远嫁漠北喀尔喀蒙古拉开了清廷与漠北喀尔喀蒙古联姻的序幕。土谢图汗部为喀尔喀四部之首,“内则哲布尊丹巴,住锡库伦,外则邻接俄罗斯,有恰克图互市,形势特重,号称雄剧”^{[18]14401}。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御驾亲征噶尔丹,在凯旋途中即安排筹办恪靖公主的婚事。一是第三次亲征告捷,举办婚礼,图其吉祥;二是土谢图汗等人来见康熙帝,便于当面商量婚事^[46]。清廷通过恪靖公主的联姻,使土谢图汗部倾心内附,达到了进一步控制、绥抚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政治目的。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在巡幸围猎途中专程从围场西行,看望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的恪靖公主。清帝对蒙古姻亲的关切拉近了皇室与蒙古王公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满蒙双方的情感联结,出现了“蒙古臣仆,亲如家人父子”^[47]的良好氛围。

综上所述,木兰围猎在牢固满蒙同盟、强化军队建设以及维系满蒙联姻等方面发挥了长效作用,是“满蒙同盟”的基本国策得以施行的重要依托,促使满蒙双方成为军政与同、姻亲相通的共同体。满蒙双方通过木兰围猎制度这一政治纽带,始终保持着亲如一家、休戚与共的政治同盟关系,成为清代民族融合和国家治理的典范。有清一代,众多蒙古勋戚协助清廷“天、崇开国,康雍御准,咸同之间,荡定粤捻,均收其助”^{[18]8311},成为清王朝开疆拓土、维护国家稳定和边疆安全的中流砥柱,为维护清朝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木兰随围与边疆多民族的交融汇聚

清朝遵循“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纲”^{[48]69}的祖制,在乾隆时期,木兰围猎从满蒙同庆的狩猎盛会进一步演变为多民族汇聚的政治典礼。乾隆帝因热河地区地处满、蒙、回、汉等民族的交会之地,“诸藩来觐,瞻礼亦便”^[49],遂在木兰围场及避暑山庄召见诸藩,临时约期,且不再受班次限制^[50],藏、回等各民族王公以及汉族文武大臣随围观猎,并在避暑山庄朝觐清帝、共商国是。木兰随围强化了边疆多民族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提高了清廷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和处理边疆事务的行政效率,进一步巩固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奠定了清朝“大一统”局面的基础。

1. 班禅热河觐见与兴教安边

木兰围场是清廷维系蒙藏关系并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场所。清朝为了解决京城至木兰围场之间的停驻和物资运输等问题,在沿途修建了大量行宫,其中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皇帝进行“木兰围猎”时主要暂住之地,更成为帝王权力中心的象征^[51],与“木兰围猎”一起发挥着抚定边疆、聚合多民族的重要作用。如乾隆四十四年,乾隆帝就以“外藩毕集”,“最为便益”^[52]为由,在避暑山庄接待了六世班禅的朝觐,对于加强清廷与蒙藏之间的联系意义重大。

“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31]84},是清代维系蒙藏关系并加强民族团结的一项重要国策。明朝以来,藏传佛教在蒙古诸部广泛传播,“蒙古习俗尚黄教,得失视此为转旋”^[53],之后藏传佛教经由蒙古传入了东北地区,成为满、蒙、藏等民族共同的信仰。清军入关后,在承袭明朝蒙藏政策的基础上,施行了“因俗而治”的政策,使之“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54],确立了尊崇藏传佛教以绥抚蒙藏各部的基本方略。

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于乾隆七十寿辰之际向乾隆请求进京朝觐,乾隆帝欣然应允。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率领随从两千余人,从驻锡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经由青海、甘肃、陕西,之后特意取道蒙古地区进京^[55]。历时一年多的跋涉,于次年七月二十二日,六世班禅一行抵达热河避暑山庄,受到了乾隆皇帝及蒙古诸王、贝勒、贝子、台吉等人的盛情款待。在庆典仪式中,班禅为乾隆帝讲经祝寿,亲自施“无量寿佛大灌顶”的法事,尊乾隆帝为“文殊大皇帝”,使得清朝皇帝获得了西藏僧俗对其政治上最高统治者、宗教上世间法王的双重身份的认同^[56]。蒙古王公都争先请求班禅摩顶、求赐法名、捐献“供养”,“喀尔喀久为世臣,厄鲁特亦无不归顺。而一闻班禅额尔德尼之来,其欢欣舞蹈,欲执役供奉”^{[57]61-62}。班禅用实际行动向蒙藏地区各民族传达了对清朝多民族统治的拥护,进而达到了“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16]223}的目标。

在班禅停留承德的一个月内,乾隆还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举行了多次大型宴会,许多非藏传佛教信徒的参与,使得此次朝觐超越了宗教和民族的范畴,成为清代多民族汇聚、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集会。参加宴会的除了杜尔伯特亲王、土尔扈特贝子等蒙古亲王之外,还有回部阿奇木伯克及喀什噶尔

伯克乌鲁克、金川木坪土司等四十余人扈从^{[31]855},呈现了“中外一家速葱岭”^{[25]362}的盛况。朝鲜、印度等许多外国使节也参与其中,朝鲜使臣朴趾源就在行记《热河日记》中记载了宴会的盛大场景。在此次多民族汇聚的宴会中,乾隆更多地将班禅视为代表西藏藩属势力之一,与其他王公共同接受皇帝的恩泽,展现了清朝团结蒙、回、藏等多民族的国家治理政策,有效地巩固了边疆多民族的政治合作基础,巩固了多民族边疆的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表达对班禅一行的重视,乾隆于热河仿照扎什伦布寺修筑了须弥福寿之寺,“都纲及寝室,一如后藏式”^{[57]61},以供班禅临时居住。须弥福寿之庙与避暑山庄附近的藏传佛寺并称为“外八庙”^④,成为京畿地区的藏传佛教中心。在清朝统治者兴建佛寺的带动下,蒙古地区修建了汇宗寺、善因寺、庆宁寺(巴雅尔—巴雅斯呼朗图希特)、丹巴多尔济寺(沙信尼巴达拉古鲁克齐寺)、普宁寺(图格默里阿木尔吉古鲁赫齐苏默)等寺院^[58]。甚至在天山南北蒙古族聚居之地修建了巴伦台黄庙等一批藏传佛寺,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中心。藏传佛寺的出现使首都、北疆乃至西域都出现了统一的文化景观,由内而外形成了以北京、承德等京畿地区的皇家寺庙为中心,以近京蒙边寺庙群等为重心,以新疆等环边寺庙点为辐射区域的地缘宗教格局^[58],发挥了藏传佛教在边疆多民族社会中凝聚民心的作用。

班禅的进京入觐活动展现了乾隆帝“国家百余年升平累洽,中外一家”^{[57]61-62}的愿景。乾隆帝通过对六世班禅的礼遇,使班禅额尔德尼等成为蒙藏地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领袖,满、蒙、藏在精神层面结为一体,取得了“敬一人而千人悦”的效果。乾隆帝凭借礼重藏传佛教的典礼,将中原王朝的政治影响力延伸到边疆地区。从北京辐射边疆地区的藏传佛寺、塔院等相同文化景观的营造,不仅成为多民族的信仰依托,也构建起了丰富多元的文化信仰场域,增强了清朝“大一统”多元民族的认同意识。

2. 伯克“分班随围”与西北边疆多民族的家国认同

木兰围场亦是南疆伯克觐见皇帝的重要场所。清朝平定天山南北之后,于南疆回部实施了伯克年班入觐制度,准许进京觐见皇帝的伯克参加木兰随猎。木兰随围成为清王朝强化西北多民族的家国认同意识,巩固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要举措。伯克年班入觐是清代治理边疆地区的重要政治制度,强化了

新疆回部与清廷的紧密联系。乾隆二十四年,兆惠在平复新疆班师回朝之时,带领贝勒霍集斯、公噶岱默特、署理阿奇木伯克和什克入觐,开创了南疆伯克入京朝觐的先例。乾隆二十五年伯克年班制度逐渐成为定制,南疆各城伯克分三班轮流朝觐^{[31]747}。乾隆帝尤其强调让六品以上的伯克参与,令其每四十人为一班进京,之后又将四品以上伯克分成四班,每年二十人轮流入觐^{[31]626,926}。乾隆三十九年后伯克年班制度正式确立,清廷将南疆伯克分为六班,每班遴选一位阿奇木伯克,由新疆各城驻扎大臣遣送入京。嘉庆十六年(1811年),伯克年班调整为九班,由阿奇木伯克带领每年轮流朝觐^[59]。伯克的频繁入觐,使京师出现了“新疆诸部,络绎来庭”^{[23]514}的景象。

木兰围场周边如今仍留存有大量与南疆伯克随围相关的碑刻,其中《射一首》诗碑题记中记载了回部王公霍集斯随围木兰之事。霍集斯是南疆乌什、阿克苏两城的伯克,乾隆二十年,清军在格登山之战中大败准噶尔大汗达瓦齐,霍集斯在达瓦齐南逃经过乌什之时将其擒获并交付清军,为平准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霍集斯协助清军稳定南疆,屡立战功。乾隆二十四年霍集斯随同兆惠班师回朝入觐,受到乾隆帝的盛情款待,并随同乾隆帝参与木兰围猎,成为最早获得随围资格的伯克之一。碑文载:“回部郡王霍集斯伯克等,自京扈跸。”“赴木兰朝谒,既命观围,并携至山庄锡宴,因令侍观习射。”^[60]随着伯克入觐的制度化,伯克随猎逐步效仿蒙古成为常规。清廷准议“回子伯克”与都尔伯特、土尔扈特、青海、乌梁海等一众蒙古王公按年赴木兰“归化向风,分班随猎”^{[48]69},使得获准随围的对象从回部个别贵族扩展至整个伯克群体。

伯克“分班随围”大大提升了南疆伯克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清廷借此达到了“凛天戒,鉴前车,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25]349}的目的。首先,木兰围猎作为清朝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直观地向南疆伯克展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据乾隆二十六年《永安湃围场殪虎》诗碑记载,伯克在扈从随猎期间,亲眼见证了清军重要军备——虎神枪的强大威力,“虎神枪一发毙之,厄鲁回部胥扈随咋舌脱帽”^{[35]183}。其次,木兰随围是清廷给予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的回部伯克的认可与嘉奖,彰显了清廷招徕远人的胸怀与气度。前文所述霍集斯伯克就是因擒获达瓦齐的功绩,获得了赴木兰观围的奖赏^[61]。这种上下联谊、恩威并济的措施也增强了入觐伯克

的荣誉感和家国认同,进而促进了回部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乾隆三十年噶匪纳齐伯克和硕尔曾在其弟阿璘发表参与乌什动乱的言论时,厉声斥责道:“我曾入觐,见大皇帝威福,且赏赉甚重,尔如何出此妄言,再不改悔,必呈报处治。”^{[31]101}和硕尔对清朝统治的坚决维护正是入觐制度下新疆上层贵族群体家国认同意识的重要体现。

总之,伯克“分班随围”不仅密切了清朝与西北民族之间的往来,而且加强了内地与新疆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打破了南疆地区相对封闭的局面,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了清王朝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深入南疆各地,促进了西北边疆各民族家国认同意识的构建。

结 语

木兰围猎作为清朝承袭祖制、保持八旗军事力量的重大典礼,不仅对于稳定北疆局势、强化国家国防体系建设意义重大,更是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历程中发挥了强大的推动作用。

木兰围猎是清朝凝聚多元民族、强化边疆民族对清王朝向心力的重要纽带。木兰围猎衍生于东北民族的渔猎传统,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清朝凝聚东北多民族的重要依托。清朝统一全国后,其主体民族为汉族,加强与汉族的交流融合是巩固清朝统治的关键一环。早在东北八旗成立之初,便有汉人加入八旗队伍,成为清朝军防体系的重要组成。因此在木兰围猎之时,行围队伍也会组织汉军侍卫卫军参加射箭比赛,参与的汉臣则多负责文书记录、后勤等事务。在此基础上,汉军旗与满蒙八旗、绿营兵相互协作,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为清朝“大一统”局面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汉族参与木兰围猎是体现清朝多民族军事协作的重要环节,也是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政治象征。对于边疆地区的多民族治理,清朝以木兰围猎为线索,以满蒙一体为核心,消除游牧与农耕文化的隔阂,并推动边疆多民族不断纳入清朝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此,木兰围猎成为清朝汇聚、融合多民族的载体和推动力之一,促使来自蒙古、青海、新疆以及中原等地的多民族群体共同铸就了休戚与共的家国认同意识。

木兰围猎制度也充分见证了清朝因俗而治、因时制宜的边疆治理历程。清朝建国后面临多元化的边疆格局,允许当地民众保持原有的社会习俗和宗教文化传统。通过木兰围猎,清廷得以有效笼络边

疆各民族的首领等上层人士,“抚取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畏,方为良法”^[31]916。如清朝对于漠北蒙古诸部的绥抚,实现了对北疆军防的战略布局;对于藏传佛教采取兴教安边的措施,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推动“政教合一”,牢固对西藏的统治;在回疆地区,则将其原有的伯克制度进行改良,因时制宜,稳定了西北边疆安全。

与此同时,木兰随围也进一步巩固了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乾隆二十二年,左部哈萨克汗阿不赉首次遣使进贡,其使臣抵达热河觐见乾隆帝并奉命参与木兰随围,次年便正式确立了朝贡关系。此后,乾隆帝下令在避暑山庄东北修建了普乐寺以供哈萨克使臣入觐观瞻。通过木兰随围,双方经贸往来迅速发展,哈萨克汗国与清朝关系日益加深,大量哈萨克人向七河、塔尔巴哈台、阿尔泰等地区移牧内附,与当地民族交往交融,并成为今天新疆哈萨克族的重要组成。

由此,木兰围猎不仅是清代创立的保持射猎传统和八旗战斗力的独特制度,也是辐射边疆、促进多民族交融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路径,开启了近代意义上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先声。

注释

①《木兰行围制度》规定:“故仁庙每岁举行秋猕之典,历朝因之,绳法先猷,永远遵行也。”昭槿:《嘯亭杂录》卷七《木兰行围制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页。②代表性著述有:张学军:《中国木兰围场史》,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赵珍:《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研究论文有:成常福、布尼阿林、袁丽坪:《木兰围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陈来祥:《试论清代木兰围场在北部边防的历史作用》,《文物春秋》1993年第4期;韩光辉:《清初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陈肖寒:《清代木兰围场的治理与周边政治单元的关系》,《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李红阳、王慧珍:《从木兰秋猕到避暑山庄——康熙年间热河的兴起与区域社会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王晓辉:《清代木兰围场管理制度的演变与边疆治理》,《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6期;张红:《清代木兰围场社会变迁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6期;等等。③这一时期康熙会面的蒙古姻亲主要有:科尔沁部:和硕端敏公主及额驸,纯禧公主及额驸,和硕额驸多尔济;巴林部:荣宪固伦公主及其额驸;敖汉部:多罗额驸罗卜藏、札木素;翁牛特部:和硕额驸苍津;喀喇沁部:多罗格格及其额驸端静公主之子;喀尔喀土谢图部:恪靖公主、和硕额驸策凌、策凌弟固山额驸,札萨克图汗部多罗额驸;西套阿拉善蒙古:和硕额驸阿宝之妻郡主;等等。根据《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三年五月”至“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条,第2089—2440页中内容整理。④“外八庙”指清代在避暑山庄修建的藏传佛教建筑群,包括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及广缘寺。因寺庙由朝廷派驻喇

嘛,理藩院发放饷银,且在京师之外,故俗称“外八庙”。参见李海涛:《“外八庙”建筑与藏传佛教》,《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2期,第42页。

参考文献

-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佟大群.东北渔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3]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8:2219.
- [4] 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顾宏义,李文.宋代日记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620.
- [6] 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2015:42.
- [7]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6.
- [8] 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9] 李景瑞,铁男.满族围场的由来及其历史作用[J].满族研究,1999(2):58-62.
- [10] 徐世昌,等.东三省政略[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1026.
- [11] 清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2] 赵珍.清代盛京围场处[J].历史档案,2009(4):65-72.
- [13] 刁书仁.清代东北围场论略[J].满族研究,1991(4):36-40.
- [14] 刁书仁.清代八旗驻防与东北社会变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80-181.
- [15]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记[M]//李澍田.吉林纪略.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106.
- [16] 魏源.圣武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0.
- [17] 贺建,赵晓彤.清代“木兰行围”制度演变[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3):16-19.
- [18]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9] 毕国忠,李文甫.避暑山庄文化与辽金捺钵习俗[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1):29-36.
- [20] 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1] 袁媛.诘戎讲武:乾隆木兰秋猎的宫廷图画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24:8.
- [22] 刘文波.康乾时期的清帝北巡与木兰围场设置问题探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42-59.
- [23] 清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4] 昭槿.嘯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5] 钦定热河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49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6] 李伟.清代木兰秋猕研究:兼论清前期对蒙古政策[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3:40-41.
- [27] 赵云田.清代的“围班”制度[J].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3):68-71.
- [28]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2.
- [29] 清朝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30] 西清.黑龙江外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 [31] 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2] 徐启亮.清宫武备[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18.
- [33] 赵琰哲.紫禁城里的时间映像:透视清代宫廷绘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159.
- [3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5] 林从炯,海忠.承德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 [36] 会典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

- 社,2007.
- [37] 赵翼.檐曝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14.
- [38] 戴逸.清史研究与避暑山庄:中国承德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 [39]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129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03.
- [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39.
- [41] 袁森坡.乌兰布通之战考察[J].历史研究,1983(4):136-150.
- [42] 温达.平定朔漠方略[M].乌鲁木齐:新疆文化出版社,2016:381.
- [43] 成崇德.清代边疆民族研究[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111.
- [44] 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J].民族研究,1983(2):45-54.
- [45] 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71.
- [46] 郭美兰.格靖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述略[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4):63-69.
- [47] 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御制诗文十全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649.
- [48] 袁丽坪,韩利.木兰围场碑文释译[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
- [49] 齐敬之.外八庙碑文译注[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1.
- [50] 赵珍.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2.
- [51] 张亚辉.六世班禅朝觐事件中的空间与礼仪[J].中国藏学,2013(1):92-100.
- [5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41.
- [53]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0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66.
- [54]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319.
- [55] 柳森.六世班禅朝觐路线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1):148-160.
- [56] 柳森.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112.
- [57]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4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 [58] 祁美琴,安子昂.试论藏传佛教的王朝化与国家认同:以清朝敕建藏传佛寺为中心的考察[J].清史研究,2019(1):1-16.
- [59] 张双智.清代朝觐制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73-174.
- [60] 避暑山庄管理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碑文辑[M].内部资料,1975:45.
- [61]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编委会.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82.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Mulan Hunting in Ethnic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Anfu

Abstract: Mulan Autumn Hunt was an official hunting activity establish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it was also a political ceremony that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unity of the multi-ethnic Qing state. The system of Mulan Autumn Hunt originated from the hunting customs of the Northeast ethnic groups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Nalbo system. Its purpose was to maintain the martial customs of the Eight Banners and enhance their military skills, and it became a spiritual and cultural bond that united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Northeast China. In addition, the Qing Dynasty took advantage of Mulan Autumn Hunt to pacify the Mongolian tribes,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chus and the Mongolians. This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Qing Dynasty to stabilize the governance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alliance of "one family of Manchu and Mongolian". Mulan Autumn Hunt constructed a space field for the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frontier. During the hunting period, leaders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from frontier region followed the hunt and paid homage to the Qing Emperor to discuss state affairs. This not only greatly enriched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Mulan Autumn Hunt, but also made it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Qing Dynasty to deepen its governance measures of governing according to local customs and adapting to the times, and enhanc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multi-ethnic state in the frontier. It promoted the final formation of the "Great Unification" pattern of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Mulan Autumn Hunt; Manchu-Mongolian Alliance; ethnic integr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长亭